

分类号:

UDC

中山大學

博士学位论文

古玺文字研究

学位申请人: 肖毅
导师姓名及职称: 曾宪通教授
专业名称: 汉语言文字学

2002 年 4 月 28 日

摘 要

本文简要回顾了古玺文字的研究历史，从地域的角度研究古玺文字的形体和语辞，并对古玺中的一些疑难字提出自己的释读意见，力图为古玺文字勾勒出较为清晰的图景。其中：

古玺文字形体研究：从基本点画、偏旁部首、文字形体、合文等四个方面考察古玺文字的地域性，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尚未为人注意的地域特征。

古玺文字语辞研究：主要从古玺自铭、职官、地名、姓氏、成语等方面研究古玺语辞，总结前人较为零散的研究成果，尝试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。

古玺文字考释：考释一些未释或尚存疑问的古玺文字，并考察某些古玺文字的地域特征，对一些古玺的地域归属提出自己的看法。

关键词：古玺 古玺文字 地域性

A STUDY ON THE CHARACTERS ON ANCIENT BULLAS

Major field of studies: The Chinese Langue and the Chinese Characters

Ph. D Candidate: Xiao Yi

Supervisor: Professor Zeng Xiantong

ABSTRACT

This dissertation reviews briefly the history of the studies on the characters on ancient bullas, studies the form and words of these characters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, and gives interpretations on some knotty characters. It tries to outline a clear picture for these characters. The following are some of the emphases:

A study on the form of the characters on ancient bullas. This dissertation studies the regionalism of these characters in four aspects: elementary strokes, character components, character form, and combination characters; and after summing up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redecessors, points out som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were not found before.

A study on the words of the characters on ancient bullas. This dissertation mainly studies the words of the characters on ancient bullas, in some aspects such as self-calling names, official names, place names, surnames, and set phrases; synthesizes the scattered achievement of the predecessors; and tries to give some of the author's ideas.

Explanation of the characters on ancient bullas. This dissertation explains some characters which haven't been explained, or which have questions; observes and studies some ancient bullas'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; and gives some ideas on the regional ownership of some ancient bullas.

Key Words: ancient bullas characters on ancient bullas regionalism

目 录

摘 要	I
ABSTRACT	II
目 录	III
第 一 章 绪论	(1)
第一节 研究简史	(1)
第二节 目的意义、研究材料与方法	(5)
第 二 章 古玺文字形体研究	(8)
第一节 基本笔画	(8)
第二节 偏旁部首	(12)
第三节 文字形体	(17)
第四节 合文	(23)
第 三 章 古玺文字语辞研究	(30)
第一节 自铭	(30)
第二节 职官	(34)
第三节 地名	(49)
第四节 姓氏	(65)
第五节 成语	(78)
第 四 章 古玺文字考释	(84)
第一节 官玺考释例举	(84)
第二节 私玺考释例举	(87)
第三节 成语玺考释例举	(89)
第四节 古玺文字释丛	(92)
第五节 古玺文字分域例举	(97)
结 语	(104)
参考文献	(105)
引用书目简称表	(113)
附 录 引用玺印陶文选	(114)
后 记	(123)

第一章 绪论

第一节 研究简史

古玺的研究，大约可分为晚清至建国前、建国后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三个阶段，主要包括著录、考释、构形研究、分域研究、断代研究、综合研究等方面。

古玺印的著录虽早在宋代，但直至晚清人们才明确古玺的时代。同治元年（公元1862年），吴式芬编《双虞壶斋印存》正式标出“古玺”类，并分出“古玺官印”、“古朱文印”，列在秦印、汉印前。此为古玺研究的开端。

光绪九年（公元1883年），吴大澂作《说文古籀补》，对古玺文字多有考释，在该书正编所收的1400余字中，古玺文字就有570多个，代表了当时研究古玺文字的水平。其后，1925年丁佛言编纂的《说文古籀补补》、1935年强运开的《说文古籀三补》等都收录了大量的古玺文字。第一部收录古玺文字的专书，则是1930年罗福颐先生编纂的《古玺文字征》，是对此前半个世纪以来古玺文字研究成果的总结，共收录可识的古玺文字计629字，附录约650个，标志着对古玺文字认识不断深入，学者们已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。

这时期突出的成果，是古玺文字时代的确定。陈介祺曾提及“朱文铜玺似六国文字，玉印似六国书法，近两周者。”又“宋以来，止知有秦印，不复知有三代，今以钟鼎通之，乃定已。”（见《簠斋尺牋》），但正如罗福颐先生所言：“清末，学者对战国古玺文字之时代多慎重，只称之为古玺，陈簠斋亦作游移之辞，说似六国文字。”[1981（五）]而王国维则首先肯定古玺文字是六国文字，在《桐乡徐氏印谱序》中，他根据罗福颐先生所辑的《古玺文字征》稿本中的一些古玺文字与《正始石经》古文、《说文解字》古文以及出土战国文字大量相合的例子，认定古玺文字为六国文字。并且指出“然则兵器、陶器、玺印、货币四者，正今日研究六国文字之唯一材料，尤为重要，实与甲骨、彝器同。”^①从此，古玺文字才正式成为战国文字的研究内容。

关于古玺的文辞，最先识出战国官玺的是王懿荣，光绪七年（公元1881年），其为高庆龄作《齐鲁古印攷序》中称：“玺之具官名者是出周秦之际，如司徒、司马、司工、司成之属，半皆周官。”1915年，罗振玉在《赫连泉馆古印存序》中提出：“古玺中有成语印”，次年在《赫连泉馆古印续存序》中进一步确定。

此后，陈邦福的《古玺发微》虽然简短，但对古玺方方面面多有涉及，具通论性质。王献唐的《五灯精舍印话》内容相当广泛，形制、文字等各方面多有涉及。

建国前的古玺研究多注重对古玺的搜集与著录，古玺的考证显得很薄弱。

建国后，随着古文字，尤其是战国文字研究的深入，古玺研究比前期有长足的进步，重视古玺文字的考释，并已开始从整体上分析研究古玺文字。

有关古玺研究的论文一向比较零散，最早出现的以考释古玺为主的专书是黄质的《宾虹草堂玺印释文》，由吴朴堂整理，于1958年在上海出版。原收于《宾虹草堂

^①见《观堂集林》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303页。

玺印释文》中的古玺印有 700 多方，吴朴堂从中选取 239 方，其中有些玺文的释读甚为精当，如释“庆”、“𠄎”、“𠄎”、“𠄎（信）”等。

次年，李学勤先生的《战国题铭概述》在 7 月到 9 月的《文物》杂志上连载发表，虽然这并不是一篇专门讨论古玺的文章，除对古玺文字进行比较归纳、介绍一些重要的传世古玺外，第一次论及古玺的地域性。

在文字考释方面，影响较大的有 1972 年朱德熙先生、裘锡圭先生在《考古学报》上发表的《战国文字研究（六种）》和其后在 1973 年第 12 期《文物》上发表的《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》。前者考释出“𠄎”即“遽駟”，为管理传驿的官职，后者论证了战国时代的“官”可写作“𠄎”，考释出古玺中的“官”字及从“官”的字。

“文革”以后，古玺文字的研究逐渐进入繁盛时期，尤其是在罗福颐先生主编的《古玺汇编》、《古玺文编》出版以后，古玺研究空前发展，在很多方面都取得骄人成绩，涌现了大量优秀的研究论文和专门论著。研究的范围更广，程度更深，更为注重实物与文献的合证，而且专题越来越细致，如专门研究一字的地域特征，对成语玺的研究，对合文的研究等，古玺研究已经成为非常成熟的分支学科，许多学者运用古玺文字作为突破口来释读古文字。

著录方面，罗福颐先生主编的《古玺汇编》和《古玺文编》由文物出版社于 1981 年出版。《古玺汇编》收录套色古玺 5708 方，并附有释文；《古玺文编》按《说文解字》顺序收录玺文 2773 字，其中正编收 1432 字，合文 31 字，附录 1310 字。虽然两书在释文和编排上尚有可商之处，但两书的刊出为古玺文字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，对古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1983 年吴振武先生的《〈古玺汇编〉释文订补及分类修订》则是对一些不足之处的修订，1998 年施谢捷先生的《〈古玺汇编〉释文校订》又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订正。

此后另一部较为重要的印谱，是康殷先生、任兆凤先生主辑的《印典》，该书 1994 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齐，全书共四大册，除收录秦汉以下印章外，还收有大量古玺，按字编排，并附有检字表，甚为便利。

通论性的著作有 1981 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、罗福颐先生著的《古玺印概论》，该书把 1963 年由其与王人聪先生合著的《印章概述》一书的内容吸收融化，并有新的发明。全书共分十四章，分别介绍了历代印玺的书体名称、纽制、物质、类别、由来、时代考证等，是有关玺印的一部重要的专著。书中不乏独到见解，可惜稍嫌简略。其后有马国权先生的《古玺文字初探》（1980 年）、何琳仪先生的《战国文字通论》（1989 年）、曹锦炎先生的《古玺通论》（1995 年），其中《战国文字通论》虽非专门研究古玺之作，但在讨论各系文字时，立有专门小节研究古玺在形制、文字、语辞等方面的特点，且能与各系其它文字相比较，为此后古玺的分域研究打下了基础。

《古玺通论》则是对古玺较为全面的研究，全书分上、下两编，上编具有通论性质，涉及古玺的时代、对古玺的认识和研究、形制和分类以及古玺文字的构形特色和地域特色等，下编具各论性质，将官玺分楚、齐、燕、三晋、秦等五系考述。该书对私玺及成语玺论述不多，是为不足。

这时期有文章对古玺的研究进行总结。一篇是罗福颐先生发表在《古文字研究》（第五辑，1981 年）上的《近百年来古玺文字之认识和发展》，对古玺文字的研究

进行总结，并提出若干有待解决的问题。另一篇是裘锡圭先生发表于1989年2月10日《中国文物报》上的《浅谈玺印文字的研究》。

1980年，裘锡圭先生的《战国文字中的“市”》一文把齐、燕、三晋和楚国文字里关于市的资料分别加以考释，识别出以上诸国“市”字的不同形体，为古玺文字的分域研究打开了一条新思路。

1981年，叶其峰先生在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上发表《战国官玺的国别及有关问题》一文。对《古玺汇编》所著录的一些战国官玺根据地名、官名、形制、字体等标准分析国别。1984年，吴振武先生的《战国“𠄎”（廩）字考察》一文对战国文字中的“廩”字作了详细的分域研究，涉及较多的古玺材料。1986年，汤余惠先生的《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》释出了古玺中的一些难字，而且还对《古玺汇编》所收的楚、齐、燕三国玺印做了初步分类。

汤余惠先生的《楚器铭文八考》（1983年）和《楚玺两考》（1984年）、李家浩先生的《楚国官印考释（四篇）》（1984年）、郑超先生的《楚国官玺考述》（1986年）、刘钊先生的《楚玺考释（六篇）》（1991）、林清源先生的《楚国官玺考释（五篇）》（1997年）考释了一些楚国的玺印，黄锡全先生的《古文字中所见楚官府官名辑证》（1991年）、拙文《古玺所见楚系官府官名考略》（2001年）则对楚系官玺有较为全面的汇释，1998年罗运环先生的《论楚玺及其他》对楚玺的起源、内容、特点、功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。

1996年吴振武先生《燕国铭刻中的“泉”字》释出了燕玺中的“泉”字，同年其《释双剑谿旧藏燕“外司圣錡”玺》则颇有见地。又其《燕国玺印中的“身”字》（1998年）考释了燕玺中特殊写法的“身”字。1998年李家浩先生的《燕国“海谷山金鼎瑞”补释》考释出玺文“谷”字。

1991年，葛英会先生的《释“戴丘涖盟”玺》、《战国齐“徙𦉳”玺与“爰土易居”》两文皆为考释齐玺，前者认为“戴丘涖盟”玺可能产生于春秋，是须句国的遗物，若此说成立，则可为春秋时期已使用古玺找到一个确凿的证据。后者则研究了齐“徙𦉳”玺的释文及其性质。1996年，吴振武先生《齐官“𦉳象”考》收入《尽心集——张政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》，是文对齐玺“𦉳象”的释读提出了新的观点。

赵超先生的《试谈几方秦代的田字格印及有关问题》（1982年）则专门研究秦国的官玺。1990年，王人聪先生的《秦官印考述》共收录秦官玺65方，是较为系统的秦官玺研究。同年王辉先生《秦印探述》则论及官玺、私玺、成语玺，较为全面。1999年许雄志先生编的《秦代印风》则是著录秦印的专书。

2001年，庄新兴先生编《战国玺印分域编》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。此书可以看作是唯一一本古玺分域研究的专书，书中将三千余方古玺分为燕、齐、楚、晋、秦五系，并有释文。书前有《战国玺印分域考》一文，详细分析了各系古玺的地域性。书后附有《战国玺文常见特色部首和字分域表》，按系别列有“人”、“女”、“马”、“都”等三十个部首和字的形体。该书虽多可取，然释文和分域间有可商。

以上可见，对古玺的分域研究已渐趋细致，系统性也在加强，这是古玺研究的新特点。

古玺的考证仍是这一时期的重点，学者们不再局限于仅仅是考释文字，而是有意识地结合文献等，较为深入。

1978年12月，在长春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，朱德熙先生提交的

《战国陶文和玺印文字的“者”字》一文，释出古玺中的“者”和“都”字。

1979年，叶其峰先生的《试释几方工官印》介绍和考证了一些不经见的官玺。

1981年，于豪亮先生的《古玺考释》考证了“长坪君相室玺”等五方古玺。

1983年，黄盛璋先生的《“匈奴相邦”印之国别、年代及相关问题》指出传世的“匈奴相邦”玉玺应是三晋的官玺。曹锦炎先生的《释壘》考释出古玺中的“犛”以及一系列从犛声的字；朱德熙先生的《古文字考释四篇》也释出了古玺中的“犛”字，还释出了古玺中的“椋”（读作郭）和“受”字。裘锡圭先生的《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》，考释出古玺中的“胎”、“脂”、“絲”等字以及以这些字作偏旁的一系列字。

1985年，曹锦炎先生的《战国玺印文字考释（三篇）》释出古玺中的“襄”字和合文“五鹿”、“余子”。陈汉平先生的《古文字丛释》考释了一些古玺文字。

1989年，吴振武先生的《古玺合文考》考释了古玺中的“中阳”、“弋阳”等18个合文。

1990年，裘锡圭先生在《“诸侯之旅”等印考释》一文中，考释了见于《安昌里馆玺存》和《续衡斋藏印》中的三方与“旅”有关的楚国官印。

1991年，吴振武先生发表《战国玺印中的“虞”和“衡鹿”》，考释了燕国的“左吴”玺（读作“左虞”）和楚国的“行寰”（读作“衡鹿”）玺。这与朱德熙先生[1985（十二）]指出齐官玺中的“桁”、“左桁”、“右桁”是掌管山林的衡可相互印证，有助于战国官制研究。

1992年，何琳仪先生发表《古玺杂识续》。文章详细考释了“阴”、“豫”、“京”等十个字及其所从的若干字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考释“鄒鄒”即“祝其”，确认“鄒鄒亭玺”为楚国陶文，这对稀见的楚国陶文而言，具有重大意义，作者还提出这里的“其”可能是“徐夷”方言，为地名后缀，有待进一步研究。同年李家浩先生在中国古文字学年会上提交的《战国官印考释（六篇）》一文，多有创获，可惜未能睹见全文。

1993年，董珊先生发表《古玺中的燕都蓟及其初封问题》，根据所考释的燕玺的“壘都司工”驳斥了“燕国始封于燕山，后来并蓟而居”的旧说，指出燕国初封就在于蓟，而蓟的具体位置就是“约在今北京外城之西北部”。汤余惠先生的《“卑将匠乌信玺”跋》也于同年发表，释出“卑酱”当读作“裨将”。

1996年，高明先生发表了《说“罍”及其相关问题》一文，考释齐国陶文玺印常出现的“罍”应隶定为“罍”，疑即文献中的“照”字，当是代表官府检验合格的凭证，此外，作者还认为一直未有定论的“𠄎”当为“𠄎”。同年还有施谢捷先生的《古玺印文字考释五篇》，释出“欧牛”、“龙文”、“女曷”、“铎”、“九侯”等。

1996年，李家浩先生的《战国官印考释两篇》释出三晋官玺“千亩左库”，并释楚玺“大鳳”为“大廩”；王人聪先生的《战国玺印考释（七篇）》考释“参枳司寇”等七方古玺；以上两文见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》。同年吴振武先生的《战国官玺释解两篇》载于《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》，其“鱼玺”之释确不可易。

1997年王人聪先生的《战国吉语、箴言玺考释》对一些文字易识但文义难明的成语玺作了解释。

1998年出版的《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》中收有曾师宪通先生的《论齐国“逯盟之玺”及其相关问题》，文中考释七方与誓盟有关的齐玺，此外，曾师还进一步考释了“馭择吉金”、“在长屨”、“馭逯其尻而短之”，由此勾勒了甲骨文𠄎衍化为“屨”、“屨”两种写法的线索，为研究文字的演变提供一条宝贵的参考资料。同年，施谢捷先生的《古玺印文字丛考》（十篇）释出“白牛”合文、“四水”合文等。刘钊先生的《玺印文字释丛》（二）也在同年发表。吴振武先生的《古玺姓氏考（复姓十五篇）》考释出“马矢”、“大叔”等复姓。

1999年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古文字研究》（第一辑）收有多篇有关古玺的论文，其中吴振武先生的《战国玺印中所见的监官》对旧释为“丞”的“𠄎”字提出了新的释读意见；施谢捷先生的《古玺双名杂考（十则）》考释了“不脂”、“石子”、“巨梁”等人名；徐在国先生的《战国成语玺考释四则》释出“千金”、“亲寿”、“善人”等成语。

2000年，施谢捷先生的《古玺复姓杂考（六则）》考释出“公户”、“在丘”等复姓。

上面对古玺及古玺文字的研究作了简要的回顾，限于篇幅，这里只择其大要，读者可以参看文后的参考文献部分。

第二节 目的意义、研究材料与方法

一、目的意义

古玺是指秦以前的玺印（秦印较为特殊，可延及汉初^①），目前传世的古玺大都是战国时期的遗物，它是当时政治关系的凭证、经济交往的信物以及祈祥厌胜的佩饰，对研究当时的历史、文字以及古代艺术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。

古玺文字内容丰富，诸如人名、地名、官名、成语等，为研究古代官制、地理沿革、先秦姓氏等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材料，古玺文字不但可以证史，而且能够补佚。

官玺是战国时代官吏任职和行使权力的信物。战国时代官僚机构已相当庞杂，而现存古籍对于这个相当庞杂的系统的记载又过于简略，许多详细情况不得而知，而官玺则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信息。例如楚国官玺，文献就语焉不详，黄锡全先生在《古文字中所见楚官府名辑证》一文中对楚玺以及其他古文字材料中出现的官府名、官名百余条详加考证，其中包括14个府、16个宫室机构和80多个职务[1991(七)]，是楚国官府机构、职官制度的实物见证，这对研究楚史、楚文化无疑是一大贡献。

古玺中的许多地名是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，例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枚“平陆”战国古玺，石志廉先生在《馆藏战国七玺考》一文中据玺印形制和文字结构，定为战国时三晋遗物，并考证其为周初虞国，春秋为晋大阳邑，汉置大阳县[1979(1)]，这样便将文献遗漏的战国时期此地称谓补上了，充实了历史地理学的内容。

古代文献是历代传抄下来的，在历时漫长的岁月中，传抄难免会出现错漏，据玺文可校正史籍中的讹误。如李家浩先生在《楚国官印考释（四篇）》一文中对楚玺“五渚正玺”的考释，认为历史文献记载的五湖、五都等皆为“五渚”之误[1984

^① 李学勤先生谓秦印“自然不限于短促的秦代，而可上至战国末的秦，下及于汉初。”见《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古玺印选·序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7年。

(2)]，这样便使《战国策·秦策一》、《韩非子·初见秦》等处的记载错误得以改正。

从古玺人名还可研究先秦姓氏名字，例如私玺中有不少复姓，有些后世久已消失，但可与汉印互证，对研究古代姓氏谱氏是有价值的，如吴振武先生在《古玺合文考》一文中考证《古玺汇编》3099号印中的“白羊”为复姓，与陶玺“白羊城”、汉印“白羊并印”可互证[1989(十七)]，从而丰富了姓氏谱系的内容。

田野考古工作中，墓葬内发现古玺，可据以考知墓主身份、姓名等事项。如1994年苏州真山墓地D1号战国墓中出土了一方铜印，张照根先生在《苏州真山墓地出土大量珍贵文物》中推断这方“上相邦玺”为楚春申君所用，从而推断D1号墓为春申君墓[1995]。

古玺文字是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资料，战国文字上承春秋金文，下启秦汉篆隶，是汉字形体演变的重要时期，而古玺文字则为研究战国时期文字的变化规律诸如简化、繁化、异化、同化等提供了大量实证。此外，由于地域的差异，古玺带有较为浓郁的地域色彩，各国文字也存在较大差别，这样，一方面可通过古玺形制的不同来认识各国文字，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对各国文字的认识来确定古玺的国别。文字和形制的互证为战国文字的分域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标识。比如楚玺“金”旁多作“𠂔”、“𠂕”、“𠂖”等形体，不同于他国，这样，金旁作此形的古文字资料便可定为楚系文字资料。其他还有齐玺中“马”字作“𠂗”，燕玺中“市”字作“𠂘”，三晋古玺中“都”字作“𠂙”等等。

目前有关古玺及古玺文字的论文论著虽多，但甚为零散，且无专著论述古玺文字，因此在导师曾宪通先生指导下选定《古玺文字研究》作为博士学位论题。在这篇论文里，笔者将对古玺文字的形体及语辞作地域性考察，尝试为古玺文字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图景，对一些古玺文字的释读提出自己的看法。

二、研究材料

本文研究的主要材料是古玺文字，其中楚、燕、齐、三晋以《古玺汇编》中的文字材料为主，秦则以《秦代印风》为主，间或有所补充。

三、研究方法

本文主要包括古玺文字形体研究、古玺文字语辞研究、古玺文字考释等三个部分。其中古玺文字形体研究、古玺文字语辞研究基本上是在分域的基础上进行的，即先对原始材料作分域、分类处理。分域采用通行的五分法，即将古玺分为楚、燕、齐、三晋、秦等五系，不明系别的归入待考；分类即在分域的基础上把古玺分为官玺、私玺、成语玺等三类，不明类别的归入待考。在此基础上研究古玺文字的形体、语辞。古玺文字考释则是用偏旁分析法、形体系联法、因声求义法等古文字学方法，结合文献，尝试考释若干疑难文字，并考察某些文字的地域性。

四、相关问题的说明

- 1、为行文的便利，暂将“三晋”简称为“晋”。
- 2、分域主要依据字形、形制、语辞等三大标准。
- 3、对单字玺的分域、分类较为谨慎，一般归入待考。
- 4、文中的方形玺指长、宽差在十分之一以内（含十分之一）的玺印，长条形玺指长为宽的两倍以上（含两倍）的玺印，其余矩形的玺印为长方形玺。

5、本文出自《古玺汇编》的玺印依原书编号；出自《秦代印风》的玺印编号为笔者所加，其中数字指原书页码，拼音字母则按从左至右、从上至下排列，依次为A、B、C、D……。

6、因本文引用之处较多，为简便起见，一般在“[]”号内标明所引观点或释文的出处，不易说明者则注释之；另参考文献依出版年代为序，一则便于查检，二则可窥见古玺文字研究发展的脉络。

第二章 古玺文字形体研究

春秋、战国之际，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，这对汉字形体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一方面，文字逐渐扩散到民间，文字的应用越来越广，使用文字的人也越来越多，文字形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，形成了汉字形体发展史上空前混乱的一个阶段；另一方面，由于春秋以来长期的封建割据，文字的地域特色逐渐形成，其中，秦国地处西僻，各方面发展比东方缓慢，文字较多地继承了西周的文字传统，而东方各国文字演变颇为剧烈，地域色彩尤为浓厚。作为战国时期的古玺文字，正反映出这些变化。

古玺文字形体研究一般包括构形规律和地域特征两方面的研究。

古文字构形规律，研究颇为详尽，有较多的专文专著研究，也有许多论文论著论及，如刘钊先生的《古文字构形研究》、陈炜湛先生、唐钰明先生的《古文字学纲要》、高明先生的《中国古文字学通论》、何琳仪先生的《战国文字通论》、曹锦炎先生的《古玺通论》等。这些规律大略可概括为简化（省形、省声）、繁化（增形、增声）、异化（异形、异体）以及特殊符号（替代、区别、美化）等，其中异形包括离析、结合、讹误、变形等，异体包括方位互作、形符互作、音符互作等，多适用于古玺文字。当然，由于古玺文字刻铸在方寸之间，因之在构形方面有一定的特色，主要体现在章法方面，诸如偏旁的穿插、挪移等，而借用边框则独具特色。

古玺文字地域特征的研究与战国文字的分域研究密切相关。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胡光炜先生著《齐楚古金表》就已经注意到齐、楚两系文字的不同特点[1928]，五十年代李学勤先生在较为全面地考察战国文字地域性特点的基上，提出了战国文字五系分域理论^①，符合战国文字实际，已为学界普遍采用。

战国文字的地域性主要表现在风格和结体等方面，在古玺文字中有较为全面的反映。总的来说，五系古玺文字各具特色，楚系线条流畅，结体散逸，燕系线条工整，结体规矩匀称，白文略嫌板滞，齐系笔画匀称，官玺较为粗犷，私玺较为细润，晋系线条细劲，结体整饬，秦系字形略长，线条圆转流畅，结体略散。

有关古玺文字地域特征，在一些相关的研究中，涉及较多的论文论著有吴振武先生的《〈古玺文编〉校订》、许学仁先生的《战国文字分域与断代研究》、汤余惠先生的《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》、何琳仪先生的《战国文字通论》及其《战国古文字典》、曹锦炎先生的《古玺通论》、庄新兴先生的《战国玺印分域编》等。本章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古玺文字的地域性，通过对古玺文字较为详尽的排比分析，力图发现一些尚未为人注意的地域特征，为古玺分域提供一些较为可靠的形体标志。

第一节 基本笔画

战国时期基本笔画不仅以其质感体现文字的风格，而且还以其形态体现战国文字的地域性。这也反映在古玺文字中，如齐国涂黑三角形饰笔[汤余惠，1986(十五)]、齐国文字竖画上附加赘笔[何琳仪，1989，90页]等，有些特征则多见于玺印，如秦

^① 见《战国题铭概述》，《文物》1959年第7、8、9期连载。

国“印”字末笔形笔至中间部位突然下坠[王人聪, 1990]、燕国所谓的鹤头书[汤余惠, 1986(十五)]等。

本节将讨论一些基本笔画及其变化。

1、横画上加短横

(1) 楚

可(可 3221)	何(何 2985)	苛(苛 5651)	阿(阿 0317)	苛(苛 3230)
下(下 0097)	恚(恚 5567)	愬(愬 2555)	亚(亚 1882)	邪(邪 2112)
恶(恶 2068)	正(正 3749)	恒(恒 5700)	莫(莫 1617)	産(産 3661)
夙(夙 5590)	詹(詹 0647)	信(信 2630)	雍(雍 5480)	戠(戠 5482)
张[徐宝贵, 1994(3)]2556)		中《古玺通论》图 117)		颯(颯 2527)
曼 ^① (曼 2553)				

(2) 齐

正(正 0298) 盤(盘[吴振武, 1996(1)]0640)

(3) 晋

正(正 4784)	不(不 0560)	阿(阿 0993)	侯(侯 1091)	平(平 0092)
石(石 1153)	奇(奇 1682)			

(4) 秦

更(更 144E)	启(启 113E)	辰(辰 147B)	图(图 210C)	颯(颯 51A)
獠(獠 149D)				

可以看出,这种现象以楚为多。“可”及从“可”的字横画上加短横较为常见,且多见于楚;“正”字横画上加短横则分别见于楚、齐、晋。此外,楚尚有在横画下加短横者,如 上(上 0008)、室(室 0228)等。

2、短横饰

即用短横将两竖向笔画连在一起,见于齐系“立(立 0289)”、“倚(倚 0641)”、“丘(丘 4014)”等字。

3、悬点

古玺文字中的点,各系均有,如楚“徒(徒 0351)”、燕“徒(徒 0013)”、齐“圭(王 0482)”、晋“长(长 0782)”、秦“亭(亭 3093)”等,其中以燕系为多,秦为少。

这里所谓“悬点”,指封闭笔画中悬空的点(有的作短横),有些悬点属文字表意部分,有些则是饰点。悬点以燕系为多,楚系尚未见,颇具地域特色。燕系古玺中的悬点或为饰点,如“公(公 3841)”、“起(起 3320)”、“寿(寿 1889)”等,而有些悬点则仅见于燕系,与它系有别。如“明”字燕玺作“明(5079)”,晋玺作“明(4374)”;“昌”字燕玺作“昌(4986)”,楚玺作“昌(2189)”,晋玺作“昌(1109)”;“夏”字燕玺作“夏(0015)”,楚玺作“夏(3643)”,晋玺作“夏(2723)”;“良”字燕玺作“良(3592)”,晋玺作“良(1377)”。

4、实心笔画

(1) 楚

山(山 2556)	丁(丁 1690)	岡(岡[刘钊, 1990(2)]1617)	車(車 3517)
上(上残 1458)			

^① 此字刘钊先生(《玺印文字释丛(二)》,载《考古与文物》1998年第3期)、施谢捷先生(《古玺汇编》释文校订,载《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,1998年)、何琳仪先生(《战国古文字典》,中华书局,1998年,196页)皆释为“曼”,可从。

(2) 燕

山(山 3849) 冫(丁 3850) 𠂔(范 2284) 𠂔(桤0054) 𠂔(旦 5583)
 𠂔(诂 5282) 𠂔(每 3053) 𠂔(海 3515) 𠂔(2802) 𠂔(产 0119)
 𠂔(𠂔 [何琳仪, 1986 (2)] 3820) 𠂔(谷 [李家浩, 1998] 0363)
 𠂔(阿 0011) 𠂔(3267)

(3) 齐

𠂔(玺 0200) 𠂔(才 3222) 𠂔(桤0172) 𠂔(奎《古玺通论》图 122)

(4) 晋

山(山 0924) 𠂔(部 2170) 𠂔(每 3043) 𠂔(旦 0670) 𠂔(会 3165)
 𠂔(在 0305) 𠂔(团 [吴振武, 1983] 0714) 𠂔(𠂔 0527) 𠂔(玉 0897)
 𠂔(丁 3167) 𠂔(𠂔 1691) 𠂔(𠂔 3417) 𠂔(旗 0952) 𠂔(3193)
 𠂔(余子 0907) 𠂔(邸 [刘钊, 1991] 2160) 𠂔(邸 [刘钊, 1991] 2144)
 𠂔(定 [吴振武, 1983] 3061) 𠂔(𠂔 1825) 𠂔(痲 [吴振武, 1983] 2645)
 𠂔(瘡 [李家浩, 1998] 3989) 𠂔(产 0125)

(5) 秦

山(山 140C) 𠂔(岸 185A) 𠂔(胡 112E) 𠂔(丞 28B) 𠂔(丁 167C)
 𠂔(亭 35F) 𠂔(𠂔 77F) 𠂔(𠂔 95B) 𠂔(把 156D)

实心笔画以燕、晋、秦为多，楚、齐为少，齐有较为规整的三角形饰，颇具特色。山、丁、𠂔等字（偏旁）较为常见，除齐外，它系均有。

5、横画上的短竖

以燕、齐、晋为多，多见于言、酉、页、丿、辛、章等字，如燕玺“谨”字作“𠂔(1280)”、齐玺“辛”字作“𠂔(1269)”、晋玺“旗”字作“𠂔(0953)”等。秦则见于“𠂔”旁，如“疾(疾 80A)”，为后世“𠂔”旁所本。楚尚未见。

6、垂笔

这里垂笔指横向笔画右端下垂。以晋为多，楚仅见，而齐则未见。

(1) 楚

𠂔(𠂔 2060)

(2) 燕

𠂔(单 3632) 𠂔(辛 1248) 𠂔(章 0710) 𠂔(己 3322) 𠂔(𠂔 0766)
 𠂔(迳 2626) 𠂔(外 0365)

(3) 晋

𠂔(正 4784) 𠂔(政 1003) 𠂔(是 1635) 𠂔(定 3061) 𠂔(事 4167)
 𠂔(革 3103) 𠂔(池 4041) 𠂔(徒 2614) 𠂔(章 0903) 𠂔(长 0744)
 𠂔(吴 1167) 𠂔(义 5606) 𠂔(武 1759) 𠂔(成 2897) 𠂔(𠂔 1761)
 𠂔(城 3442) 𠂔(余子《古玉印精萃》18页)

(4) 秦

𠂔(越 235F) 𠂔(戎 19A) 𠂔(忌 52E)

“戈”旁垂笔最为常见。燕、晋两系中的“章”字垂笔不同，燕系为下部横画右端下垂作“𠂔”，晋系为上部横画右端下垂作“𠂔”。

7、尾饰

汤余惠先生认为“齐文字又有一种尾形饰笔，一般多加于斜划或横划的末端。”[1986 (十五)]与此相似的饰笔也见于燕、晋、楚，而且燕玺较为常见，只是不一定在笔画末端，在这里，姑统称为“尾饰”。

(1) 楚

较少见，仅“客”字有尾饰，作“𠂔”（5548）。

(2) 燕

在向右下斜出的笔画上缀短饰，如：

𠂔(长 0693) 𠂔(张 2830) 𠂔(尤? 3305) 𠂔(夏 0015) 𠂔(頊 1234)
𠂔(3869) 𠂔(諷 3671)

(3) 齐

多在斜划或横划的末端加短饰，与它系有别，如：

𠂔(徇 0328) 𠂔(甸 0272) 𠂔(遷 0198) 𠂔(旂 3753) 𠂔(厚 2202)

也有在向右下斜出的笔画上缀短饰的，如“𠂔(路 0148)”。

(4) 晋

在向右下斜出的笔画上缀短饰，如“𠂔(饒[汤余惠，1986·(十五)]0821)”、“𠂔(虐 3831)”等。

8、区别符号

“肉”、“月”形近易混，古人有意加区别符号，见于燕、晋两系，吴振武先生谓：“在燕和三晋印或其他文字材料中，月、肉二字还有一种加饰笔的区别方法，那就是月字除了作𠂔形外，还往往在左下方加一饰笔作𠂔，而肉字除了作𠂔形外，则往往在右上方加一饰笔作𠂔”[1984]。

有区别符号的“肉”旁，燕系如“𠂔(脰[刘钊，1998(3)]5691)”、“𠂔(脰 2815)”等，晋系如“𠂔(宜 5615)”、“𠂔(肌 2454)”等。

有区别符号的“月”旁则只见于晋系，如“𠂔(月 1723)”、“𠂔(明 0961)”、“𠂔(閒 2947)”等。

9、鸟虫书

汤余惠先生指出燕有鹤头书，或即鸟书的遗迹[1986(十五)]。另外有些局部笔画加粗的字，当与所谓的虫书有关。鸟虫书是当时的美术字，多见于吴越，但是在古玺中却多见于燕玺，不知何故。如：“𠂔(乔 1227)”、“𠂔(性 2820)”、“𠂔(喜 0396)”、“𠂔(畋 1485)”、“𠂔(九 0732)”、“𠂔(秦 3853)”、“𠂔(弃 1485)”、“𠂔(王 0519)”、“𠂔(长 0745)”、“𠂔(隄 0519)”等。也见于晋玺，可确定的仅一例，即𠂔(赋 1304)；另有一印或为鸟虫书，见 3835，惜略有漫泐，未敢遽定。

10、封闭笔画

指本来不相连的笔画连在一起，构成一个封闭的部件。汤余惠先生曾注意到这种现象：“古玺梁字写成𠂔(1700)，声旁‘办’下方歧出的两笔相交于一处，与此类似，各字玺文或作𠂔(2641 𠂔字所从)，备字写成𠂔(0862)，冬旁变化与前举办旁道理相同。”[1986(十五)]

这种现象有较强的地域性，以晋为多，如：

𠂔(各 3355) 𠂔(零 2641) 𠂔(𠂔 2276) 𠂔(备 1097) 𠂔(郤 2139)
𠂔(复 2263) 𠂔(柔 3229) 𠂔(梁 5656) 𠂔(郟 1707) 𠂔(郟 1711)
𠂔(疾 2137) 𠂔(脰[刘钊，1991]2778) 𠂔(常[刘钊，1991]1429)
𠂔(缙[汤余惠，1986(十五)]2871)

楚玺仅见于“心”旁，如“𠂔(心 4501)”、“𠂔(志 4524)”等。齐玺也很少见，如“𠂔(寿 3676)”，齐另有一玺文作“𠂔”(3925)，或释“布”[何琳仪，1998，1485页]，如是，则也为一例。

11、断开笔画

古玺文字中笔画断开现象以晋玺为多见。

玺文中“大”字作“𠂔”(0102、0127)形，一般认为是楚系特征，其实，晋

玺文字中所从“大”的中间也常断开，如：“赤”作“𠂔”（0892）、“奇”作“𠂔”（1685）、“去”作“𠂔”（0856）等，秦印中也可见，如：“夸”作“𠂔”（63F）、“盖”作“𠂔”（128F）等。其他笔画断开现象，晋玺如：“𠂔（年 3281）”、“𠂔（犹 1993）”、“𠂔（敬 5001）”、“𠂔（谨 2482）”等，秦印如“𠂔（李 138B）”、“𠂔（季 61A）”、“𠂔（癸 135D）”等，楚玺如“𠂔（陈 3565）”、“𠂔（周 3507）”等，齐玺如“𠂔（马 0028）”、“𠂔（陈 1473）”等。

12、借笔

借笔指借用笔画，是文字的一种省略形式，以晋、秦为多，燕、齐、楚少见。

(1) 楚

𠂔（𠂔 3527）

(2) 燕

𠂔（都 0011） 𠂔（圣[吴振武，1996：162-165]0365）

(3) 齐

𠂔（泉 0603） 𠂔（𠂔 0063） 𠂔（铸[汤余惠，1986（十五）]3760）

𠂔（吴 1185）

(4) 晋

𠂔（吕 2506） 𠂔（纪 2301） 𠂔（吴 1177） 𠂔（和 1876） 𠂔（弩 0116）

𠂔（固 0713） 𠂔（匡 0712） 𠂔（司 3831） 𠂔（侗 2010） 𠂔（闵 1674）

𠂔（匡 4061） 𠂔（均 2873） 𠂔（啾 1902）

(5) 秦

𠂔（智 251E） 𠂔（官 231C） 𠂔（突 111A） 𠂔（裕 191A） 𠂔（冉 185F）

𠂔（李 57C） 𠂔（杨 79C） 𠂔（官 23A）

13、借用边框

指借用边框作为文字的组成部分，是一种特殊的省略形式。李家浩先生注意到：“在战国玺印文字中有这样一种情况，当印文的笔画跟印的边框平行时，往往将跟边框平行的笔画省去（有的可以看作是借用边框作为笔画）。”[1991（七）]

楚：𠂔（玺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》1979年1期88页图四）

𠂔（莫《文物》1988年2期62页）

齐：𠂔（疆 2204） 𠂔（玺《山东新出土古玺印》170） 𠂔（𠂔 0063）

晋：𠂔（狂 1013） 𠂔（戏 3154） 𠂔（郎[李家浩，1991（七）]0049）

𠂔（钶[吴振武，1984]3268） 𠂔（益 0918）

第二节 偏旁部首

1、水

何琳仪先生认为楚系水旁或作 𠂔，颇有特点[1998，1234页]，古玺文字中各系水旁特征如下：

楚：中画弯曲，四点与中画平行，作 𠂔（0212、0101）、 𠂔（0343）等形。

燕：笔画平直，上、下两端较为齐整，作 𠂔（0017、0018、0362）形。

齐：中画一端略有弯曲，四点向两侧微撇，作 𠂔（0603、2599）、 𠂔（1947）等形。

晋：中画下部皆作折笔，多作 𠂔（1581）、 𠂔（2964）等形，间有作 𠂔（1667）形者。

秦：或近小篆作 𠃉 (23 B) 形，或略有变异作 𠃉 (34A) 形，或省为三点，作 𠃉 (32C) 形。

2、耳

楚：楚玺未见。楚简多作 𦉳 (包2·175) 形。

燕：左画上端略向左曲，下端或直出作 𦉳 (2797) 形；或向右弯，但不超出右边竖画，作 𦉳 (3207) 形。左画及右画或有饰笔，如 𦉳 (1500)、𦉳 (2797)。

齐：左竖上端与上横左端皆不突出，左、右两画皆直出，右画有饰笔，作 𦉳 (0590)、𦉳 (3705)、𦉳 (3222) 等形。

晋：左画下部右弯并延至右画下，中横与右画多作一笔，如 𦉳 (2952)、𦉳 (2404) 等，仅一例作 𦉳 (4511)，与楚简类同。

秦：左画下部右折，作 𦉳 (137F)、𦉳 (233F)、𦉳 (143C) 等形。

3、辵 (兼说止旁)

汤余惠先生注意到燕系辵旁作 𧾷 [1986 (十五)]。按各系辵旁皆有特色：

楚：“止”位于“辵”右下侧，底画或为横画，如 𧾷 (0335)，或为较对称的弧线，如 𧾷 (1567)。少有作 𧾷 (1592) 者，近齐。

燕：“辵”第三笔作折笔，末端或下垂，如 𧾷 (0010)、𧾷 (5573) 等。“止”作 𧾷 (0010)、𧾷 (0511)、𧾷 (5573) 等，其中 𧾷 (5573) 颇有地域特色。

齐：“止”位于“辵”下，中画着点在右画上，如 𧾷 (1433)、𧾷 (0198) 等。

晋：“止”右边两画交叉，如 𧾷 (2463)、𧾷 (1283) 等。

秦：近小篆，作 𧾷 (67B)、𧾷 (131C) 等形。

4、女

吴振武先生认为燕系女旁作 𡚦 [1984]，其说可从。

楚：多作 𡚦 (5623) 形，左笔、中笔作平行的斜画，或加饰笔作 𡚦 (3756)。

燕：中画竖直，上端或有斜笔；左画多作横向弯折，间或竖直；右边多作缺口状。如 𡚦 (3425)、𡚦 (0190)、𡚦 (3663) 等形。

齐：左竖、中竖直出，如 𡚦 (1944)，中竖上端或有斜笔，如 𡚦 (3687)。

晋：作 𡚦 (2525)、𡚦 (3338)、𡚦 (1004)、𡚦 (2360) 等形，其中作 𡚦 (2525) 与齐近，余则左画或中画略有弯曲。

秦：或近小篆，如 𡚦 (47A)；或近隶书，如 𡚦 (86D)、𡚦 (113 H) 等。

5、斤

楚：作 𠃉 (0143)、𠃉 (0281) 等形，笔画微曲，有较强的笔意。

燕：皆作 𠃉 (3867) 形，左画上端有横折笔，笔画平直方正。

齐：作 𠃉 (2197) 形，笔画也平直方正，左画上端无横折笔，与燕有别。

晋：左画上部向右上斜出，笔画直。右画上部多向右下折，作 𠃉 (2963) 形，也有作 𠃉 (2386)、𠃉 (2390)、𠃉 (2518) 等形者，较少见。

秦：或近燕作 𠃉 (81C)，或近晋作 𠃉 (84C)，或近小篆作 𠃉 (5707^①)。

6、疒

楚：古玺未见。楚简多作 疒 (包山2·47“痾”字所从)，少作 疒 (包山2·174“瘡”字所从)、疒 (天星观·遣策“疾”字所从)、疒 (包山2·171“瘳”字所从) 等形。

燕：多作 疒 (2402) 形，长竖下端作折笔。左边横画多作单笔，少作复笔如 疒 (3550)。长竖下端或弯曲，如 疒 (2812)。

^① 此玺文反书。